

【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世纪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对“故乡”与“他乡”关系的建构

——以陈仓和付秀莹的创作为中心

靳瑞霞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较多沉溺于“渴望+苦难”的叙事模式。新世纪以来,陈仓与付秀莹的相关创作则表现出对该模式的超越趋向,为如何将“他乡”(城市)转变为“故乡”提出建构思路。但同时,因作家经验的个体性、反思的滞后性以及创作思维的惯性等,二者在城市(他乡)意象与乡村(故乡)意象塑造中,又表现出对既有创作模式的沿袭,使“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建构路径最终蹈空。归根结底,其原因在于作家们代际性地日益脱离鲜活真实的乡土现场。只有准确把握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时代转型,获取当下真切的乡土经验,相关文学创作才可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关键词:农民进城;他乡;故乡;建构路径;乡土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11-0137-07

“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是指以生长于乡村的农民为谋生目的进入城市之后的生活和生存境遇为内容的小说创作。该类题材创作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创作^①。历经革命及政治的特殊时期后,经济、社会体制变革意义上引发的“农民进城”题材小说创作,则以路遥的《人生》为代表。伴随着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打破,这一题材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规模,并在21世纪初成为一股创作热潮,涌现出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②。这一专注于表现城乡互动关系中的“进城者”的创作潮流,既超出了原有“乡土文学”的边界,又不能归入城市或都市文学,成为世纪之交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此类创作的内涵指向较为集中,一是表达农民对城市的极度渴望,二是呈现农民进城之后悲惨苦难的生存境遇;在精神向度上则一边倒地悲叹乡土命运、批判城市文明,呈现出某种单向度、模式化的创作特点。

在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回不去的故乡”

与“融不进的城市”给“进城者”带来的精神上的焦虑与漂泊感,成为较为突出的社会情感诉求,引发较大范围的社会心理共振。“他乡”与“故乡”所带来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愈加凸显。以陈仓和付秀莹^③为代表的“70后”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现象,开始介入这一题材领域,呈现出颇有意味的创作突破。与之前的作家相比,二者在该类题材创作方面有何特点和局限?推而广之,面对剧烈转型中的现实中国,当代文学相关创作有何表现?新世纪的“城市”与“乡村”——“他乡”与“故乡”——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关联?作为“他乡”的城市能不能成为“进城者”所追求的“故乡”?如果能,又将通过什么路径成为“故乡”呢?

一、城市(他乡)意象塑造悖论

“他乡”与“故乡”是一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而存在的,包蕴着丰富的时空关系、行为姿态与情感结构的文学概念。二者一个对应着出发地和过去;一

收稿日期:2020-06-06

作者简介:靳瑞霞,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 450001)。

个对应着到达地和现在。走出之后,被抛在身后的才成为“故乡”,奔赴的远方即是“他乡”。奔赴的“热望”、失望,进而又引出怀念、怀恋的“回望”,情感又在其间获得双向流动。“进城”题材创作也因此天然地拥有两个互相映照、互相牵制的意象——城市与乡村,它们分别由想象与实际所构成。陈仓与付秀莹对这两组意象是如何表现的,对以往类似题材中的文学表达有何承续或拓展呢?

先看城市意象塑造。这两位作家笔下想象中的城市充满了诱惑。主人公对城市的情感与对乡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的情感产生在离开之后;对城市的情感却发生在进城之前。这种先期萌生的充满美好想象的情感可以称之为“憧憬”或“热望”。二人首先表达的是进城农民对转变和提升自身身份地位的希冀。譬如陈仓《傻子进城》中的“傻子”,就因为羡慕走出塔尔坪的“叔叔”回来时的风光无限,远方的城市便成为他心目中“美好”或“梦想”的代名词,他想尽办法要“进城”。付秀莹的《他乡》同样是在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中展开,首先也是身份转变的需求。女主人公翟小梨的回忆之所以自高中毕业开始,就是因为对当年高考失利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高考扼杀了她进入城市的梦想——“乡下的孩子,对于大学的想象,无非是,借着大学的纵身一跳,到城里去”^④。身份地位的提高,同时还意味着金钱权力的获得。陈仓《女儿进城》《麦子进城》等几篇作品中出现的小记者“陈元”虽然实际上穷苦潦倒不得志,但在老家人的想象中,他处在权力的中心,有钱有势,因为他们认为获得了城市人身份就获得了金钱和权力。

都市景观和都市文化所构成的城市意象也在作品中得到展现。城市中的高楼大厦、电梯、马桶等城市景观与现代设施,以及高消费、讲享受等都市文化都成为城市意象的具体阐释。《父亲进城》中“我”迫不及待地将上海的“楼高、人多、有钱”等现代化景象展示给父亲,将电梯的便利、马桶的舒适、足浴的享受塞给父亲。这既是对他自身前期城市想象的一种满足,也是表达自己对城市的一种文化认同。在付秀莹这里,关于城市整体性的想象则附着在有关城市的日常形式上,例如城市的名字、城市的语言、具有城市身份的人等。“南京”这个城市名字在小梨心中是“动听、迷人”“陌生的,洋气的”“光芒四射”。章幼通标志着城市身份的普通话,以及他有

别于乡村的谈话主题和生活内容,都构成城市意象,对翟小梨产生巨大的吸引,在她“熟悉的芳村的日常之上,熠熠生辉”^⑤。在翟小梨的眼里,那个考到南京去的男孩子,“平凡的容貌里竟然平添了一种动人的光彩”^⑥,更别说天生拥有城市身份的章幼通了。在陈仓和付秀莹笔下,这种对城市的渴望是主人公奔赴城市的动力之源,对主人公的人生选择起到很大的主导作用,翟小梨嫁给章幼通就是女性进入省城一个最直接的途径。然而热切的渴望落实到行动中,终究会发现想象与现实是有落差的,这种落差就体现在二者对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塑造上。

在陈仓笔下,现实中的城市充满了龌龊,想象中的美好在进城之后一个个被打破。主人公陈元很快发现,“乡下人”的身份在大都市是如此格格不入。他到了自己单位门口,门卫却仗着上海土著身份,不认他的居住证,硬是拦着不让进。对他而言,有权有钱有自由的幸福生活目标显得遥不可及。在追求而不得,遭受各种歧视与不公之后,作者笔下的上海城市意象随之发生了改变,主人公对城市不再是“热切的爱慕”,语气转为酸楚与讥嘲。如上海城市地标——东方明珠塔——变成了“大锥子”,不仅扎眼,更是扎心。一栋栋高楼也丧失了现代化的美感,被作者以粗鄙尖利的“戳破天”来形容。主人公身边没有亲人,孤独又潦倒,城市中的物象也呈现出“病态”——连上海的月亮也似乎“患了黄疸肝炎”。整个城市意象出现反转,呈现出病态化的表征。

付秀莹则透过城市中人际间伦理情感的自私隔膜,塑造出现实中冷酷的城市意象。《他乡》中的翟小梨真正落脚省城之后,在婆家只感到公婆和大姑姐的冷漠自私。章幼通在自己家住还要交生活费,“父母和孩子之间,钱是钱,亲情是亲情”^⑦。幼通姐姐虽然与他们同住父母家,房间的门却经常冷冰冰地闭着,“像一张面无表情的脸”^⑧。工作上翟小梨也因户口被排除在福利待遇之外,“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例外。一个异类”^⑨。她在家庭关系和同事关系中不被认可,在遭遇各种不公正、不顺利之后,她心中的城市意象也随之变化——不再熠熠生辉,而是变成“幽暗的,喧嚣的,黑黢黢,深不可测”^⑩。

在对待城市爱情的描写上,二者的创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陈元”无论是在《米昔进城》中与米昔,还是在《小妹进城》中与黑小春,似有若无似浅

又深的情感,总是被犹疑或误会一刀斩断;而《他乡》中小梨与幼通的婚姻也差点儿被更大的“进城”步伐截停。城市中掺杂着太多其他因素的爱情,也成为二者塑造现实中城市意象的典型构成。

无论是最初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还是后来对城市的各种不适应,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乡村社会走出来的人的真实感受。然而,从对城市的美好想象到不被认可的挫败感,这样对城市的想象性和体验性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其实早已经不再新鲜。这种对城市的“热望”正是当代“进城”题材文学创作的逻辑起点。路遥的《人生》是此类题材创作的滥觞和经典之作。高加林对城市文明的幻想与热望不仅击败了乡村权力者高明楼,也击败了巧珍美好纯粹的爱情,但最终还是在城市的现实中残酷破灭。铁凝的《谁能让我害羞》中,纯真的香雪变身为同样来自乡村的年轻送水工,为了获得城市的认同,她在现实中受到无情的精神戕害。李佩甫、邵丽、尤凤伟、方方、艾伟等一众实力派作家,在世纪之交都涉足过此类题材。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则是将这“热望”进行了历史梳理,以农村妇女宋家银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人生经历,呈现农民命运在此种“进城”渴望引导下的极致走向。从“热望”到“挫败”,在“进城者”题材小说中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模式。

然而,从时代发展的角度看,新世纪又十年来,信息化的高速发展,网络的日渐普及,加上雾霾、拥堵与污染的痼疾,城市相较于乡村的神秘感与优越感已经大大降低。交通的便利,户籍的松动,使留在城市不再是遥不可及。与此同时,网络的加持,使乡村的生活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乃至社交模式,也在以让人惊诧的速度向城市看齐。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针对乡村展开的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正如铁凝所指出的,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①。著名评论家阎晶明曾这样评论陈仓的写作:“我觉得他……写对城市复杂的感受,甚至在作品中会把城市和乡村决然的对立起来,这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这么写的话,也具有一定的虚伪,或者说不真实的色彩。”^②陈仓与付秀莹的相关创作附着了过多过去的乡村经验,并没有做出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的代际突破。也许对他们个人来说,不能否认其基于少年生活阶段的经验真实——姑且不论这种“回忆性真实”自带的净化或过滤功能,但对当今时代来讲,这已经不能作为新世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经验。

二、乡村(故乡)意象塑造悖论

当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被打破,当城里的生活充满了坎坷不平与伤害,回望来时路成为自然的选择。故乡作为“进城者”的出发地,在“进城者”不自觉的一次次对比中,充满了诗意和美感。然而,在纯粹以故乡为对象的叙事场景中,故乡又以一种凋敝的或势利的面貌出现。作家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几副滤镜?到底哪一种才是当下真实的乡土现实?

首先看乡村的诗意呈现。陈仓所有作品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陕西丹凤一个叫塔尔坪的小山村。与上海意象中的拜金、自私、虚伪、冷漠相比,陈仓在“进城”系列中对故乡塔尔坪进行了充满怀念的回望。这回望中的诗意既由乡村的植物意象所构成,包括五谷杂粮、玉米、花草与树,也有味觉的意象存在。在《空麻雀》中,秋天的风里是“五谷杂粮的气息”,是“玉米正在壮浆的味儿”^③。少女陈雨心16岁生日的盛大礼物,是“丹江河两岸几百亩田野里,金黄地咧着大嘴巴的玉米棒子”^④。在作家笔下,乡村是有香味的。“有些凉意的夹带着野菊花香味的晚风,吹拂着每一根小草与每一片叶子。”^⑤《父亲的棺材树》中“我”爱着“轻轻推开院门”吱呀一声的感觉,连院门的味儿都是“香喷喷的”家的感觉。这种自然的诗意与人际间的亲切,与大城市的远离自然以及人际间的重重防备,形成鲜明对照。

在付秀莹的回望中,诗意的乡村意象则由亲人、庭院、家畜、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以及和谐亲密的人伦关系等构成。付秀莹的小说主人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芳村。在《他乡》中,芳村以一种亲情牵系的面貌出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情不自禁地,我开始想念远在家乡的亲人了”^⑥,想起夏夜母亲的蒲扇,“把我们的梦都摇远了,长了”^⑦,“蝉鸣仿佛雨声一样落下来。月光银

子一般,铺了一炕一地”^⑮。在伦常方面,与婆家家庭关系的不伦不类相比,翟小梨芳村的家中是“形容举止端正,从来不曾失了形状……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⑯。在翟小梨不得不将女儿放在芳村二姐家养的那一段时光,付秀莹将充分的诗情画意赋予了芳村。二姐家的小院里,种着丝瓜和西红柿,“蝉声落满了院子,好像是盛大的辉煌的鸣唱,好像是金色的雨点在空中飘洒”^⑰。芳村有安静吃草的大黑牛,“眼睛湿漉漉”的小绵羊,“毛茸茸的小鸡小鸭子”,会哼哼哼哼撒娇的猪。“清晨的芳村,安静,清新,透明,仿佛清水洗过一般。”^⑱这种诗意,这种美,也是作为都市文明的一种对照出现的。

然而,在作家其他作品中,故乡又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在《父亲的晚年生活》中,塔尔坪几乎是衰败或衰亡的。首先是人员的不断流失,村子里人口只减不增。“如今族谱没法修了,晚辈们都进城了,有的在城里打工,有的在城里安了家”^⑲。“如今塔尔坪的这九个大院子……唯一没有的就是年轻人,也没有孩子在这里出生”^⑳。其次是树木的滥伐,导致植被破坏,山被掏空。人没了,树砍了,山荒了,塔尔坪作为一个乡村正在从物质形态上消失,依附于其上的乡村精神的命运可想而知。陈仓在创作谈《正在消失的故乡》中这样引用一个江西老表的问话:“你们春节还回家吗?我是一定要回去的,不过前几年回家是探望父母,如今回家只有一件事了,就是去上坟,对我来讲故乡就是一座坟。”^㉑怀乡的诗意被乡土凋敝的现实残酷剥离,乡土呈现出被滋养过的城市文明抽干、遗弃的命运。

芳村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表现为伦常的失序。乡村文明被以经济为本位的都市文明侵蚀,乡土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大幅向金钱至上的都市消费文化投降。如果说芳村在《他乡》中是以背景形式影影绰绰出现在对城市文明的质疑中,《陌上》则详细将这一背景的模样描画出来。芳村乍看起来有着亘古以来乡土的那种宽厚之美,它来自时间:昼夜的渐变,春夏秋冬的轮转,二十四节气间生命万物的接续;它也来自空间:沉默的孕育生命的大地,蓝盈盈的空旷高远的天,以及天地间广袤的北方原野。然而生活在其间的男男女女,早已不复从前。金钱主导和控制着一切关系,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的中心。婚姻嫁娶是要看房子、车子和彩礼的,

婆媳关系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婆婆成天瞅着媳妇儿脸色;姐妹亲情也是拮据的上赶着讨好富裕的;夫妻关系——只要挣着钱了,咋都行。一切“人”的关系仿佛都是“钱”的关系了,乡村社会赖以维系的传统道德纲常秩序悄然崩塌,向经济本位转换。如果说塔尔坪是乡村物质形式的消逝,芳村则指涉了乡村精神形式的凋敝。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这种乡村的诗意与乡村的凋敝两类叙事,几乎同时存在,也同时拥有寄情于其中的创作者与读者群。一方面,这种诗意延续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田园诗情,成为乡土文学审美的一种理想图景,进而形成下意识的叙述惯性。另一方面,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作家们拥有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供其回味。如迟子建的“北极村”东北乡村系列,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系列,王新军的“大地上的村庄”系列等,都执着于展示他们曾经经验过的、一个恬静安详的乡土世界,甚至形成了独有的地域性“审美场”。然而,从现实关照来看,乡土世界的衰败又是文学执着于表达的另一个源头,如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带灯》,梁鸿的《梁庄》,关仁山的《麦河》,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系列等,都对当代现实乡村凋敝面貌进行了犀利揭示与呈现。

这样比对当下的关于乡土或城乡互动的创作便可以发现,作家们对乡村与城市的表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一面塑造乡村美好诗意图景,一面呈现现实中乡村极其衰败的命运;一面抱怨着城市的精神空洞,不断默念着故乡的美,一面却又包扎好脚底的血泡和心底的伤痕,继续迈向与故乡相反的方向——奔赴城市,梦想扎根。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钱理群先生曾指出过现代文学中“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㉒如果说现代作家们的矛盾在于对乡土文明存在理论的鲜明“背叛”与情感的莫名“依赖”,那么当代作家们在

对乡土的情感路径上则进行了继承性发展,渐趋一致地对乡土进行诗意“礼赞”和挽歌式怀念,在理论路径上又因亲身饱尝城市文明带来的痛苦,由现代时期对工业文明的坚定立场,走向了犹疑不定与进退两难。

对乡土的诗意描写多来自作家所持的回忆或想象的滤镜,包括成年后对童年时乡土经验的回望,和返城知识分子对知青生活的回望等。对乡土的情感则来自对那一处特殊时间内成长于其中的空间——故乡——的留恋。这种由逝去的时间和远方的空间所带来的诗意,显然是回不去的。这样,故乡必然只有在作为“他乡”的对应物存在时,才被呈现出“诗意”的美。这种美是距离的产物,是不可实际触摸的。王德威对此这样评价:“由于空间上的距离感以及时间上的生疏感,乡土作家们产生了一种对故乡‘似近实远、既亲且疏’的情感。”^{②6}刘大先也在《故乡即异邦》一文中写道:“当家乡成为故乡,意味着家乡已经同他隔离开来,曾经的联系变得愈加稀薄,它慢慢隐退为一个审美的对象。”^{②7}这种距离感和隔离,是回望故乡式“诗意”产生的主要审美来源。然而,在城乡叙事中,这种诗意显然又承担了另外一种功能——遥望故乡的诗意又恰恰衬托出当前城市文明中的晦暗、阴暗甚至齷齪的部分,烘托出“进城者”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经历的种种磨难、坎坷。缅怀乡村乡土、质疑甚至批判城市,成为饱受异质文化挤压中的“城市异乡者”一个最佳情绪释放出口、一处心理迂回缓冲地。需要警惕的是,这是不是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乡叙事的一个叙述策略,甚至模式?而一旦成为模式,文学的生成将直接略过现场。创作如果难以接近和抵达真实,附着于其上的情感与思想都将因此而失效。

三、“他乡”成为“故乡”的路径悖论与可能

“出走”乡村与“奔赴”城市的行为背后,内蕴着以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博弈与导流。乡村物理空间的广大并不能掩盖现代文化知识匮乏导致的视野狭隘、经济贫困与生活模式恒常化所带来的心理空间的逼仄。这种对知识的渴求与心理发展所需的自由空间,是城市文明自带的光环。离乡与“进城”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一种必然的不可逆的探索大潮。刘大先在《故乡即异

邦》中即谈道:“人们同自己家乡的关系,往往混杂着普遍的矛盾:甜蜜温馨的记忆似乎并不能阻止冷酷无情的离别。只有眼界狭隘、抱残守缺的人才会觉得家乡完美无疵,而那些出走他乡之人的赞美与缅怀尽管可能是真诚的,也难免打上了时间与空间的滤镜。”^{②8}显然,故乡已经注定回不去了,作家们其实都心照不宣。陈仓在八卷小说每一本的扉页都标上“谨以此书献给我们回不去的故乡”;付秀莹《陌上》最后一章的开篇语是“是不是回不去的才叫做故乡”。答案其实早在心中。回不去了,只有自己说服自己,想办法在城里扎根。

陈仓说服自己靠的是“善是一味药”。他在《地下三尺》的创作谈中,对前期创作一味地表现城乡对立进行了反思:“我承认,我对庄稼的爱和土地的敬,这是一个农民伟大之处,也让一个农民带有偏见。我的这种偏见虽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是共鸣并不一定就是希望。”^{②9}城乡是有对立性和差异性的,但这种差异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至于是往哪个方向变,差异是变大还是变小,时代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陈仓主动克服或弥补这一片面性,创作了“后进城”系列,也叫“扎根”系列。他提供了一个路径:善是一味药,并施加于他的小说中。《墓园里的春天》《从前有座庙》以及《摩擦取火》中的小记者陈元被解雇了,稀里糊涂找到墓地销售的工作;因销售墓地被女朋友抛弃,又机缘巧合找到了新的女朋友。犯过事儿的陈元逃窜中流落到寺庙,开始以种种善行救赎自己,最终救赎了别人,自己也得到救赎。被冤枉的陈元打算出狱后找仇家报复,在明了各家的悲惨命运后,他选择了放下。这几篇小说,“善”的确是拿来当药用了,叙事很流畅,寓意也很明显。但是,在新时代的城乡现实面前,仅靠善这一味药就能使各种问题迎刃而解吗?这条路径恐怕过于笼统和形而上。

付秀莹则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案:体验,反思,离开;再体验,再反思,接纳,和解。在《他乡》中,翟小梨带着美好的想象从芳村到了省城,体验到自私冷漠隔膜的家庭关系和丈夫的不思进取之后,她选择再向上走,继续进城,进京。然而毕业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的留京过程,也让她看清了大都市人际关系的曲曲折折。反观婚姻,丈夫章幼通虽“不思进取”却始终耿耿深情。最终,在乡村(芳村)所提供的伦理价值支撑下,她选择了接纳与和解。她与

丈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承认拼命向上只是人生的选择之一,品格才是最重要的必选项;她也与都市中的浮华与隔膜和解,只管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就好。翟小梨的路径选择背后其实是芳村给予的稳固的乡土伦理价值观的支撑。这样一种体验、反思、选择的个人路径,显然比陈仓所提供的路径更加真实可信,更清晰,似乎更有可行性。但是,从《陌上》中的描述来看,乡村已经越来越徒具传统伦理价值的形式,当乡村的一切关系逐渐转向以经济为中心时,“70 后”作家也许还能在回忆中找到乡土的精神滋养,那么,对于“90 后”及以后的作家,这条路还能走通吗?这样推断起来,就仿佛釜底抽薪一样了。

事实上,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的,“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③0}。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是随着历史进程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必然也会随着其中某一或某几种选项的变动而变动,关于“乡”与“城”的文学表达也将呈现出别的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乡村这端尚不至于如此沦落,那些人情人性人伦道德并没有被金钱至上冲击得荡然无存,尚有余脉持续流淌绵延下来,作为支撑,供“进城者们”应对城市化的各种冲击,甚至成为影响或改造城市文明的力量,成为以后的创作者们获得思想与情感的资源,使“他乡”成为“故乡”得以可能。赵本夫创作的《无土时代》中关于以乡土改变城市的构想,固然因“理念先行”而被人诟病,然而也并不能因此否认未来不存在这样一种方向的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城乡关系的落差不是拉大了,而是缩小了。这样的话,进不进城,扎不扎根,“他乡”用不用变“故乡”,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说到底,“农民进城”是当下中国社会剧烈变迁导致的。社会变迁又“常是发生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发生了苦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应之前就把它抛弃。旧的生活方式有习惯性的惰性。但是如果它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③1}。当下之中国大约就处于“新环境”的发生与“旧方法”的适应磨合期。这“新环境”与“旧方法”并不单指城市或乡村、城市文明或乡土文明的任意一极,而应指城乡融合的大环境对城乡二元对立思维的“旧方法”提出了新要求。

这种来自关系两端的调整已经从个人、群体,上

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比如近几年三农政策的密集出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高频高强度宣传渗透,以及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工作的如火如荼;媒体中已经出现相当数量关于返乡创业的报道,城市中愈加注意与“进城者”密切相关的户口、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从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农村正在发生变化,乡村的价值在逐渐升高;城市也在发生变化,对自然与生态越来越注重。两端在发生变化,城乡关系必然也会发生变化。当乡村价值不断提升,物质丰裕,设施便利,越来越接近城市的时候,乡村自身的独有价值便会适时凸显,导流的方向就有可能改变。城市的“进不来”和乡村的“回不去”随之都有可能得到纾解。

关于城乡关系的变化,早在 2014 年评论家雷达就在《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一文中指出:“当下中国正经历着城乡转型的巨大裂变,即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历史的节奏也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③2}2018 年,经济学家刘守英也从农民与土地与村庄的关系变迁角度指出,中国“已由过去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③3}。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中国的社会形态将包蕴更多、更复杂的历时更久的文化、情感、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变迁。乡土的存在是以农时、农事、农具、农作物、民居、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附着于其上的民俗、节庆、自然观、人伦观、亲情观、价值观等一整套物质基础与精神形式所构成的。当其中的主体——农民——成规模地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质精神场域中迁移时,任一环节的不适都能构成社会的不适。雷达将针对这种迁移的创作称为“亚乡土叙事”:“它远非传统乡土文学中的地域和民俗所能涵盖,也不是启蒙时代的传统批判。这是不是一种更加宽广的道路,是不是一种更有现代意味的诗性呢?”^{③4}要想把握和表达这种“不适”中隐藏的“诗性”,必然首先要获得转型期中这种真切的“连筋带肉”的不适感。贾平凹曾说:“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有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

瞻性,你的作品中就有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⑤否则,复杂转型期下新时代乡土经验的匮乏将不仅阻碍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与乡土相关的城市文学创作也将因此步入“失真”甚至“失语”的境地。

归根结底,文学创作要首先与当下转型中的乡土现实联通。只有准确把握真实的乡土现实,才有可能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物做出准确的思想认知与情感表达。在深入现实方面,作家们应该有更恰当的方式、更无缝的对接,准确评估当下“城”与“乡”的关系。在准确把握城乡关系的基础上,从个人经验的局限中走出去,融入时代精神的洪流,感受时代脉搏,才能真正在创作中揣摩和呈现关系中的人的情感落脚与命运走向。

注释

①该时期作品如潘训(潘漠华)的《乡心》、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吴组缃的《栀子花》、王统照的《山雨》、丁玲的《奔》等,基本以破产农民进城之后的流民生活为表现内容,与启蒙与革命相关联。②该时期此类题材长篇较为著名者,如尤凤伟《泥鳅》(2002)、李佩甫《城的灯》(2003)、贾平凹《高兴》(2007)等;中短篇如铁凝《谁让我害羞》(2002年《长城》)、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2002年《人民文学》)、刘庆邦《到城里去》(2003年《十月》)、邵丽《明惠的圣诞》(2004年《十月》)、项小米《二的》(2005年《人民文学》)、范小青《城乡简史》(2006年《山花》)等,作品众多,切入角度各异,结合不同的叙述结构、艺术手法,对进城农民的生存境遇、精神状态有集中而深刻的揭示。③2012年6月陈仓在《花城》发表中篇小说《父亲进城》,开启了其长达七八年的系列“进城”题材小说创作,至今已经发

表并出版二十余部“进城”系列作品。其中尤以《父亲进城》和《女儿进城》两部影响最大。2016年至2019年,青年女作家付秀莹的两部长篇《陌上》和《他乡》,也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进城”题材创作,同样引起热烈反响和评论。《陌上》2016年10月甫一问世,便引发强烈反响,先后入选新浪好书榜2016年10月总榜、新浪好书榜2016年文学年度榜等,与格非《望春风》、贾平凹《极花》等作品一道入选“2016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并于2018年10月斩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2019年长篇《他乡》出版,新浪读书则直接以“付秀莹新作《他乡》书写女性‘进城史’”为标题予以推介。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付秀莹:《他乡》,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4、15、30、50、51、53、52、51、51、51、117、136、138页。①铁凝:《在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2020年7月20日。②阎晶明:《陈仓文集》四部首发式上的发言,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9420885_729499,2018年8月18日。③④⑤陈仓:《女儿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99、109、109页。⑥陈仓:《影子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8页。⑦⑧陈仓:《父亲进城》,红旗出版社,2015年,第76、153页。⑨钱理群编:《乡风市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⑩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6页。㉑⑲刘大先:《故乡即异邦》,《十月》2020年第4期。㉒陈仓:《地下三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326页。⑳[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93页。㉓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7页。㉔⑳雷达:《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文艺报》2014年12月15日。㉕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㉖贾平凹:《写出个人和时代的命运交契,才是好故事》,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主办的“春秋讲学”的演讲,腾讯网,https://cul.qq.com/a/20160412/044597.htm?,2016年4月11日。

责任编辑:采薇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land" and "Other Land" in the Novels of Farmers Going to Cities in the New Century

— Centered on Chen Cang's and Fu Xiuying's Related Literary Creations

Jin Ruixi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reations of the novels about farmers in cities have abandoned themselves to farmer's thirst for city and their suffering in cities. Since the new century, Chen Cang's and Fu Xiuying's related creations present a transcending trend, which means raising a train of thought on building cities (other-lands) into homelands. But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ir writing experiences, the lag of their reflection, and the conventional thinking of their creation, they two show the inheritance from the existing writing pattern when they build city image and country image in their fiction. The path construction between homelands and other-lands becomes baseless eventually. The reason is that writers increasingly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real living rural scene. Only when they grasp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ized and acquire the living experiences from the countryside, they maybe can make a breakthrough on related literature creation.

Key words: farmers in cities; city; homeland; construction path; rural experience